



時局與角色

劉同赫

自 1840 年西方文化直接衝擊中國以來，中國文化經歷了四次回應的浪潮。第一浪是技術層面的回應，該浪潮的主導思想認為，學習西方的技術是復興中國文化的關鍵；其前期表現為知識分子「師夷長技」的思想潮流，後期則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運動。第二浪是制度層面的回應，此回應以為社會制度的西方化是中國文化更新的樞紐；該浪潮從戊戌變法的局部改良始，至辛亥革命的全面更替達到高潮。第三浪是文化層面的人本主義回應，這一浪潮儘管正確地認識中國的危機是文化危機，卻錯誤地認為從西方人本主義裡面可以汲取自我復興的力量；此浪潮始於五四運動的文化批判精神，最終落實在共產主義的全面文化改造運動中。正是由於三次偉大的文化自救浪潮都失敗了，中國文化才有可能在今天進入信仰層面作回應。在自我拯救的挫折面前，中國才能夠正確地反觀自我，認識中國的危機乃整體文化的危機，而僅僅憑藉中國文化(或西方文化)自身的力量，絕對無法應對整體性的文化危機。目前，中國文化中忽然興起朝向各種宗教探究的熱潮，恰是中國文化在自我拯救失敗後，尋找超越他者的必然轉向。

中國文化的危機及其對危機性質的自我認知，恰為基督教進入中國文化提供了客觀條件。上述的

客觀歷史條件僅僅表明：中國文化有信仰的自我需要，卻沒有選定哪一種信仰以填補這一需要。自春秋戰國以來，中國又一次經歷諸子百家的爭鳴，不僅顯示了原有文化精神的式微，更要尋求一種信仰或准信仰的學說作為新文化精神的核心。從表面上看，基督教巧合地在今天成熟得可以把握中國的主流文化，但正如一位先哲所說，所謂偶然性無非只是兩個必然發展的交點。中國教會現今的成熟，實際上攜帶著一千多年中國文化的發展所積累起來的歷史能量。教會在中國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浮在文化表層的階段，包括唐之景教、元之也里可溫、明以及清初的天主教；該階段的福音運動企圖以權力與知識作為福音進入中國的載體，具體的對象以肉食者或勞心者為主，其對中國整體文化的作用只在表面，而未能觸及文化的實體。第二階段是堅守社會文化邊緣的階段，乃自十九世紀 60 年代始，隨著二十世紀的過去而終結；這一階段的福音運動指向社會文化的主體攜帶者——人民大眾，從而第一次實質性地進入了中國文化，縱然僅僅波及了該文化的邊緣地帶。除了實質性進入中國文化以外，福音運動於此階段完成了全面進入中國文化的融合準備。一種信仰進入一個文化必定要經歷反合性的運動：一方面是要採取該文化的形式，

另一方面卻要在採取該文化之形式之同時不失去自我。基督教之所以具有跨文化的能力，就因為基督的生命中包含的這種反合性：「道成肉身」的文化認同與「十字架」對文化中罪性的排斥(不認同)。在第二階段中，中國的福音運動正經歷了這樣反合性的基本融合準備。一方面，由於與海外教會的聯繫和對教會傳統的傳承被人為地割斷，中國教會的主脈不得不在封閉的中國本土環境，直接從聖經與聖靈領受啟示，從而最終建立了全面本土化的基礎；另一方面，因為在長期逼迫中憑藉持守十字架，煉淨了生命中的雜質，確立了自己對世界的自我。在這反合性準備的基礎上，福音運動自世紀之交進入第三階段——文化主流的階段。教會的本土化使主流文化不再視教會為異質的洋教，而靈性生命的堅立確保教會在進入主流文化後不至喪失自我。

中國教會進入主流文化的首要標誌是，福音運動的中心從農村轉至城市，而城市正主導著中國的文化潮流(即使從數量來看，城市也馬上成為文化的主流；據國家人口統計局按目前人口移動的速率估計，至2050年，90%的中國人口將居於城鎮)。第二個標誌是福音已經觸及所有的社會階層，特別是主流文化的攜帶者。溫州私人企業家類型教會與北京知識分子/專業人士類型教會的崛起，表明了福音的傳播與主流文化的發展可以並行。上述兩種教會所代表的社會階層正是目前中國文化繁榮的關鍵要素；這兩個地區的見證證明，福音可以把握財富與知識，並通過財富與知識的福音化而祝福中國的主流文化。第三個標誌是福音不僅滲透到所有的社會文化領域，而且開始把握主流文化裡的重要資源。當然，目前福音運動只是進入主流文化，尚未主導主流文化，不過，按照上帝的計劃(以其上千年在社會與教會裡面所積累社會能量的向量)，中國文化正朝這個方向發展。

教會與社會的關係變化必定包括教會自身的改變。若要承擔進入主流文化並影響主流價值體系的使命，中國教會本身必須經歷深刻的自我更新。今天的中國教會正經歷著兩大更新。一是對內的堅固。這表現為，從幾乎完全經驗性的質樸生命形態，向系統性的自我神學表述和完整教會結構的生命形態提升。在主流文化的複雜環境裡，整全而清晰的內部結構與自我意識，是保存自我並影響他人

的前提。目前異端在中國泛濫，並不是因為靈命「病毒」的猖獗，而是上帝要借此告誡中國教會，在進入主流文化的「亞熱帶叢林」時，自身的健康程度需要提升(現在教會首要的任務不是去分辨「病毒」，而是建造自身)。二是對外的開放性。堅守在社會文化的邊緣，不免形成自身的封閉性。當開始進入主流文化的時候，中國教會明顯缺乏把握社會文化的能力，並且在心態上具有害怕甚至厭惡社會文化的趨向。把握主流文化生命容量，是中國教會能否主導中國文化潮流並成為社會核心價值觀的關鍵之一。

上帝在今天揀選中國知識分子進入教會，正是將他們用作建造教會的文化質料。在教會的內部建造方面，知識分子所帶來的知識與技術，是構成神學建設與教會發展的重要文化條件無疑。沒有知識分子的進入，教會也會形成自己的神學，但卻難以有清晰的表述形式(只表現為無法直接從生命現象分離出來的質樸神學趨向)；同理，教會的結構並不是由知識分子在頭腦裡建立的，可是，知識分子的進入卻帶來了必要的技術輔助。教會的結構是生命的結構，從而，教會結構的形成是生命發展的結果；不過，對結構的描述以及機理的解釋，會幫助生命反觀自我，由此而正確地評價自我，並決定未來的走向。在外展方面，知識與技術在現今中國文化發展中的決定性地位，使知識分子成為教會影響主流文化的重要渠道；可以說，大批知識分子的進入，是中國教會文化增容的重要步驟。大批知識分子在這個時代進入中國教會並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上帝為中國教會自我更新準備的文化資源。如果中國的知識分子僅僅回應一個所謂的「個人拯救」，便是回絕了上帝所賦予的靈命角色與文化使命。

由於首次有大批知識分子進入本土的中國教會，從而，使教會的生命栽培方面似乎出現了一個斷層。以往教導力量主要在農村與城市底層形成，當其面對大批知識分子的時候，顯然出現文化接軌的問題。不過，上帝要興起，必在歷史中有準備(上帝的興起並不是一個魔術，而是上帝早已預備卻為屬肉體之眼不能識別的歷史要素忽然展示其自身作用)。60年代美國國會放寬對亞洲的移民政策以後，許多學人從台灣、香港、南洋來到美國，其中不少人蒙恩信主，這些基督徒在北美建立的校園團

